

山阴世家与明清易代

杨海英

摘要：浙江绍兴山阴吴氏家族，在明清易代史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以万历九年任蓟辽总督兵部尚书的吴兑为中心，跻身世家行列。疏支远族的吴宗道依托家族势力，在东征时与朝鲜建立了密切联系；同支吴大斌、吴廷忠伯侄入辽又出逃，或殉节或为遗民，与毛文龙却势不两立，体现了地方新旧势力在登州和辽东地区的较量；而吴兴祚八旗新贵背后的血缘关系，被易代的政治背景人为割断，凸显出清代官方历史书写的忌讳。比对各有关忌讳的官私中外不同来源的史料，稽钩几位吴氏家族成员的履历，既可看到易代之际世家经历鼎革并维持兴盛的具体情形及特点，也从侧面反映了明朝经营辽东的困难、清承明制的表现方式及清廷塑造国家形象的手段、特点，并可加深对明清国家转型、个人与家族、社会与文化等问题多方位、多角度的体验及感悟。

关键词：明清易代 山阴世家 吴大斌 吴廷忠 吴兴祚

山阴世家是指浙江绍兴山阴州山吴氏家族。万历年间官至蓟辽总督、兵部尚书的吴兑（1525—1596）是一支大分第八世的标杆人物。^① 吴兑嘉靖三十八年（1559）中进士，万历六年（1578）任宣大总督，主持过俺答封贡，九年始任蓟辽总督，终以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致仕。娶妻骆氏、妾王氏及某，育有二子八女。

吴兑姻亲包括绍兴陶堰陶氏（参政陶大年、副使陶大有家族）、会稽商氏（大理寺少卿商为正家族）、峡山何氏（参政何继高家族）、林头王氏（南兵部侍郎王元敬家族）、余姚吕氏（大学士吕本家族）、姜氏（礼部尚书姜逢元家族）等名门望族。吴氏与新建侯王阳明家族两世联姻，显示双方关系密切：吴兑三女适新建伯王承勋（王阳明孙，父正亿为阳明嫡长男）；吴兑嫡子吴有孚的长女适新建伯王先进（王承勋长男、王阳明曾孙），吴有孚四子吴孟文娶王承勋之女，姑表亲上加亲。而吴有孚次子吴孟登娶万历朝首辅朱赓之女，也是家族强有力的政治资本。依托政治、经济、乡贯、姻亲关系织就的强大的社会关系网，^② 州山吴氏不仅稳居世家行列，也对家

^① 《明史》卷222《吴兑附孙孟明、孟明子邦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848—5850页；参见吴国柱修，吴国樑续：《山阴州山吴氏族谱》（以下简称《族谱》）第4部《一支大分第八世·吴兑》，道光十九年（1839）刊本，第23—24页。

^② 参见《族谱》第4部《一支大分第八世·吴兑》、《第九世·吴有孚》，第23—24、43—44页；第5部《一支大分第十至十一世·吴孟文》，第3页。

族子弟仕途大有裨益。^①

二支三分第八世的吴宗道（1544—1621），依托家族强大的社会关系，在万历援朝东征（1592—1598）时期，由“策士”起家，从都司到游击，活动能量惊人，博得朝鲜上下广泛关注。他还在韩国江华岛碑林博物馆中，留下了唯一一块明人纪恩碑。^②东征战争结束后，吴宗道为镇江（今辽宁省丹东市）游击，伙同时任山东海防副总兵的族侄吴有孚，利用职务之便，以麾下登州水师船队从事海外走私贸易，后被辽东巡按熊廷弼弹劾落职。^③

该家族的基本状况，虽已有了概述性的梳理，^④但相关研究仍很不足。如二支三分另外几位由明入清的关键人物，吴宗道的族父吴大斌（1556—1632）、吴大圭（1565—1618）、族弟吴廷忠（1591—1651？）等人，从江南远涉辽东后，通过结识辽东世家李成梁，谋得出路，站稳脚跟。但在女真努尔哈齐攻占辽东后相继逃亡，分别成为明朝的殉节者及遗民，却又与建立镇江奇捷的毛文龙东江势力不和谐，内中隐情尤其令人关注。吴宗道的另一族侄吴兴祚（1632—1697）也值得探究，但重要的并不是他作为清初著名“辽人”督抚的经历，^⑤而是作为八旗新贵，其家族的血缘关系却被明清易代的政治背景人为割断，这种断裂的背后反映了何种事实？凡此种种，都表明这个家族内部还隐藏着诸多等待挖掘的深层秘事，值得进一步深耕细作。（具体世系可参见文末所附《山阴州山吴氏世系简表》）

一、“东宁镇抚”吴大斌

吴大斌，是吴氏族人入辽的领头人，在明清易代过程中成为殉节者，他是吴兴祚的亲伯祖。其事迹见于该谱《晴川公小传》，原文略云：

幼应童子试，不售，乃弃举业……留仲弟镇川公事母，偕季弟越川公遨游海内，以冀其遇。至辽左，遂寓居焉，凡族人有志四方者多往归之……初谒宁远伯李公，抵掌而谈天下，旁若无人。宁远公遇之如上宾……万历丙辰，辽左失守，公遂浮海抵登州，守土者闻公至，咸以机务就问……无何，登州为孔帅所陷，欲劫公以去……遂绝食十一日，临诀嘱子侄辈曰：“吾死，若等以抚檄出郭事告之，必不阻，因而为归计可也。”公官东宁镇抚，不屑就吏，故其宦

① 参见张金奎：《明代卫所军户研究》第6章《卫所军户与社会变革》，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第373—375页。

② 该碑原题为《钦差都司石楼吴公宗道清白保民去思碑》，曾断为两截，经重新修补装填底座，安置于韩国江华岛碑林博物馆内，韩国学界的初步研究见배성수：《조선후기강화도吴宗道去思碑의 건립 배경과 의미》，韩国《仁川学研究》第4辑，2005年，第79—108页。2012年7月3日，承蒙韩国仁荷大学教授李俊甲先生陪同前往考察，得以参谒此碑，特此致谢！

③ 参见拙文：《东征故将与山阴世家——关于吴宗道的研究》，《纪念王钟翰先生百年诞辰学术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60—173页。

④ 余德余《山阴（绍兴县）州山吴氏家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基本未涉及对吴宗道、吴大斌、吴廷忠的研究，对吴兑、吴兴祚的关注点也与本文大不相同。

⑤ “辽人”是明亡清兴的重要关节，来源错综复杂、发展千变万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不断取得重要进展，如渡边修《明末的辽人》（《东北地方史研究》1985年第1期）、姜守鹏《明末辽东势族》（《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王景泽《明末的“辽人”与“辽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1期）、叶高树《明清之际辽东的军事家族——李毛祖三家的比较》（《台湾师大历史学报》2009年第42期）及黄一农《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新竹：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等，关注点虽各有侧重，但均置于明清政权对峙与转移的发展脉络下，启发笔者着重考察“辽人”的动态发展过程。曹雪芹先祖移居辽东，抑或天启元年（1621）沈阳城破时被俘入旗，与州山吴氏兴祚祖孙三代经历相似。

绩不传。宠母吴安人属公家孙媛，而宠实公家外孙，故得备闻公之行实如此云。^①

传文作者是吴大斌的玄外孙、吏部员外郎何天宠。吴大斌因家贫前往辽东谋生，结识辽东势家李成梁后，站稳了脚跟，就任东宁卫镇抚，却因建州女真兴起，浮海流亡山东登州，终受迫于东江旧将孔有德，绝食自尽，以脱子侄辈险境。需要注意的是，若无吴兑任蓟辽总督的背景，吴大斌会不会起意从江南远涉辽东、能否有机会得谒李宁远且得两说，更何况“抵掌而谈”？何天宠恐有故意回避之嫌。乾隆《绍兴府志》所载吴大斌事迹，大致根据《谱传》改编：

吴大斌，字叔和，山阴人，六岁而孤。……薄游辽左，遂寓居焉，族人多往归之。初谒宁远伯李公，抵掌而谈天下，旁若无人。……万历丙辰，辽左失守，大斌浮海至登州。孔帅陷登州，欲劫大斌以去。大斌曰：“吾家世清白，岂可就辱？”因集其从难子侄，而告之曰：“今日之事，义惟有死而已。汝等偕死无益，盍各为计。”遂绝食十一日，临死与子侄辈诀曰：“吾死，若等以抚櫬出郭，必不阻，因而为归计可也。”（《州山吴氏谱》）^②

两相对照，有四点值得注意。

第一，《府志》省略了《谱传》吴大斌“官东宁镇抚”这个细节。东宁镇抚即东宁卫镇抚，明代卫所掌管刑狱的武官，从五品，除刑狱外，还兼管盐场火丁、卤丁、卫所仓储等其他事务。驻所在今辽阳旧城，辽东都司所在地。^③ 吴大斌任卫镇抚的时间不可考，《谱传》所谓“不屑就吏”，当不是因为镇抚官品不高失载，而是由于辽左失守去职，与浮海至登州也可印证。何天宠所记的重要细节，被府志作者删去了。

第二，吴大斌前往辽东的时间，当不早于吴兑履任蓟辽总督的万历九年。^④ “族人多往归之”透露了吴氏族人前往辽东谋生、发展有相当规模。万历四十四年（天命元年），是中国历史上明清时代的分界点。这一年，明东北边外建州女真首领、58岁的努尔哈赤被尊为英明汗，正式建立后金政权。次年，即以“七大恨”揭竿反明，陆续攻占铁岭、抚顺、清河、开原、辽阳、沈阳等地，导致已在辽东站住脚跟的吴氏族人，颠沛流离，命运遭遇迥然各异。

第三，天启元年三月二十日，辽阳被后金攻陷。明辽东经略袁应泰、巡按张铨、分守道何廷魁、监军道崔儒秀等，或自刎自缢，或被俘杀，辽东遂为乱世。后金军入城时，辽阳城溃卒约万人渡河，余者均被俘或屠戮：“一酋挟利刃倨坐城闾，令鱼贯出，拊其背而送之，刃加于颈，无一免者。已杀数百人，臂竭，刃堕地，一人踉而进，延颈就死，尽如昏癫。”屠杀触目惊心，侥幸逃脱的“武弁、青衿携家航海流寓山东”，^⑤ 成为劫后余生的流民。

山东巡抚王在晋曾谈到辽民渡海避难，“蚁聚鳞集”，导致登州米价骤涌，招练使也不得不从登州移驻潍县。在安置辽民分处直隶、山东的过程中，产生争攘、窃劫、叛逆作乱、勾引、外泄内溃等“五患”，都使明政府的努力出现流弊。^⑥ 但至天启二年十二月，直隶顺天、永平、河间、保定等府，通州、涿州、武清等县，花费安插银22698两，报过安插辽人13414户，收回

① 《叙传记·晴川公小传》（以下简称《谱传》），《族谱》第30部，第12—13页。

② 乾隆《绍兴府志》卷55《人物志十五·忠节一》（以下简称《府志》），第48页b。

③ 参见张金奎：《明代卫所军户研究》第3章《卫所军户的组织管理》，第182—186页；河内良弘：《关于明代辽阳的东宁卫》，杨旸、梁志忠译，《黑河学刊》1988年第3、4期。

④ 参见《明神宗实录》卷111，万历九年四月辛亥，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7年，第2129页；卷125，万历十年六月丁酉，第2330页。次年（万历十年）六月吴兑即升兵部尚书。

⑤ 以上未指明者，均见姚希孟：《公槐集》卷4《沈辽失守始末》，《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集部，第178册，第348页上下栏—349页上栏。

⑥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7《请赈渡海辽民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0册，第503页上下栏。

安插辽人执照 13285 张，均已造册上报户部，计户拨银周济，“虽少而单贫，受惠总以相补”。^①安置辽人数万当无疑义。这就是东宁镇抚吴大斌流亡登州的背景。

第四，崇祯五年（1632）正月初三日，原属毛文龙东江旧部的孔有德等率军反叛，攻破登州城，登州道宋光兰、监军道王征及府、县官等皆成俘虏。吴大斌也被迫绝食死难，以换取族人脱离险境。时间当在破城不久的年初。

以上四点中有三个时间节点，都涉及明清易代中的重大事件。入关前清朝前世臣属于明的往事，终清之世都是禁区，民国后方为孟森先生所揭示。《府志》纂修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虽已不再忌讳记载入关前后抵抗清军的明朝忠臣义士，^②但仍遵循惯例，在有选择的提倡和无选择的严禁下，删除了吴大斌官东宁镇抚这个关键性细节，也就不奇怪了。因此，私家谱牒中保留下来的历史另一面相，就显得弥足珍贵。

此外，朝鲜使臣李民成记载吴大斌流寓登州前到过镇江，这里涉及了另一个层面的重要史实。天启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朝鲜奏闻使李民成在山东登州陈梦琛庄园中见到几位宾客，其中一人即吴大斌：

吴相公大斌送示诗稿，乃与登州兵宪及乡绅所相唱和者……吴公号晴川，越州山阴人，故游击宗道之族父也。宗道东征时以都司来驻我国，宣庙见其揭帖亟加称赏，命承文院裒集前后之揭缮写以进，后终于镇江尤吉。晴川来从镇江，今寓登州之开元寺，与田一井、刘国缙、陈梦琛为吟侣，重厚温雅且有诗声，见重于士大夫。^③

李民成透露的信息十分重要：第一，吴大斌为吴宗道的“族父”，曾在吴宗道生前到镇江投奔他。第二，吴宗道终于镇江“尤吉”，“尤吉”当为“游击”音转。万历三十七年，吴宗道因经济问题，遭辽东巡按熊廷弼弹劾被革职，之后依然居住在镇江直至终年。而东宁镇抚吴大斌逃出辽阳后，最先投靠的就是这个被革职的族侄，嗣后才流寓登州。吴宗道被熊廷弼弹劾时年已 65 岁，辽阳陷落时是 77 岁，至天启二年已辞世。在辽东都司马驄与朝鲜接待使李廷龟的谈话中被称为“先母舅”，李廷龟告别马驄诗即咏吴宗道：

平生知己石楼翁，高义堂堂国土风。

十四年来空洒涕，三千里外喜逢公。^④

李廷龟称吴宗道为“知己”、“国土”，可见两人关系不浅。从天启二年回推 14 年，正是万历三十一年，吴宗道得实授辽东守备，三年后升任镇江游击。由此推断吴宗道辞世的时间，当在天启元年三月之后、天启二年五月之前。

在此，马驄的身份也成为问题。马驄，字最白，会稽人，中万历四十六年武举，曾任登州参将，崇祯五年底，被孔有德东江叛军所杀，阖门眷属皆死节。乾隆四十一年，赐谥节愍，祀忠义祠：“聪〔驄〕坚守一月，请援不至，至溃围出战，被创者十有六，乃被擒，不屈而死。”^⑤《府志》重在表彰忠义，描述他尽忠的细节，却不载其就任登州参将前的任何经历。借助朝鲜

① 董应举：《崇相集》卷 1《进辽册疏》、《报安插辽人支給成数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102 册，第 57 页上栏、53 页下栏。

② 康熙版《绍兴府志》即未载吴大斌的事迹。

③ 李民成：《敬亭先生续集》卷 1《朝天录上·癸亥》，《韩国文集丛刊》，汉城：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 年，第 76 册，第 442 页。

④ 李廷龟：《月沙先生集》卷 34《简帖·答马都司驄（壬戌候接时）》，《韩国文集丛刊》第 70 册，第 88 页；卷 12《候接录中·赠别马都司驄》（《韩国文集丛刊》第 69 册，第 330 页）亦提到马驄之名。

⑤ 乾隆《绍兴府志》卷 56《人物志十六·忠节二》，第 8 页 a。

《光海君日记》，可知天启二年，马骢曾代表辽东都司与朝鲜谈判，被称为“马都司”。^①

《崇祯长编》所载马骢之死，与《府志》迥然不同：

山东抚按朱大典、谢三宾等射书登城，谕降原任参将马骢结龚正祥等十六人谋内应，事洩，俱死之……骢，绍兴人，素有机智，城破为贼用，能得其欢心，每与密室画计。至是呼之使出，冀骢动故主之思……骢与被擒副将龚正祥及陷贼旧将陈朝柱、龙韬、董溢、洪声、刘应宗、岳永陞等十六人，设誓歃盟，共拟擒贼以献者。谋既定，将于明日元旦有德、仲明行香水城时缚之，各官秉甲待晓。夜过半为永陞门役苏有功所告。未明，二贼遽召诸将悉斩之，内应事遂不成。^②

孔有德、耿仲明等叛明后，扣留登州军民为人质。参将马骢表面上答应与孔、耿合作，暗中却响应抚按朱大典、谢三宾等人书约，密谋在元旦孔、耿行香水城时实施绑架。行动前却因计划泄露而被杀害，同死者还有副将龚正祥等16位将官，时间为崇祯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次年二月望日，孔、耿等相继浮海而遁，登城围解。《府志》言马骢战死，与《崇祯长编》出入极大。马骢谋内应而被杀的细节，实际上关系到东江叛将与登州将官的矛盾。

天启元年七月，东江总兵毛文龙突袭镇江，与城内故将里应外合，成功擒杀后金守将佟养真。此事也奠定了毛文龙的历史地位：

先是，辽东巡抚王化贞塘报标下练兵游击毛文龙报称：……比时有辽左卫廩膳生员王一宁因辽城被陷，父子直往朝鲜投谒国王，借兵恢复辽左。……因至朝鲜弥串堡地方，潜令镇江避难人民，暗通镇江士庶，咸共响应。……卑职细观事机，当在必克。即命守备苏其民带领家兵一百名，要截去兵归路。……千总张先祖等持枪先登，众人一齐登城，喊声大震，一拥杀入。陈良策同弟陈良汉等自内杀出，内外夹攻，贼尽皆胆落，四下奔命。佟养真率夷众及家丁七十余名迎敌，家丁章得化等直前奋击，佟养贞被击仆地就缚，其子佟丰年及家丁七十余人一时斩获殆尽。^③

这段记载错讹颇多，对勘《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所载毛文龙之疏，人名及细节各有繁简，佟养真（贞）之名就有不同写法，令人生疑。^④ 但天启元年七月十九至二十日，镇江经历了一场激变，入据椴岛的明将毛文龙，联合镇江城内汉将、后金游击陈良策、良汉兄弟，执杀佟养真父子，创造了“镇江奇捷”。但却昙花一现，终以援兵不至再陷。^⑤

① 韩国史学会国史委员会编纂：《朝鲜光海君日记》卷177，光海十四年（天启二年）五月丁酉二日4条提到的辽东“马都司”即马骢其人。（汉城：探求堂，1973年影印本，第31册，第83页）

② 《崇祯长编》卷66，崇祯五年壬申十二月壬辰条，第3851—3853页。

③ 陈建：《皇明通纪集要》卷45《八月镇江奇捷》，《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34册，第531页下栏—532页上下栏。

④ 正确写法应是“佟养真”，但清代为避雍正帝名讳改“真”为“正”，引发混乱。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1《天启元、二年塘报》，与《皇明通纪集要》对勘，主要不同有二：一是毛疏“遂分兵一百余名，令千总张攀并率屯民百余”的未提守备苏其民；二是“佟养真披衣迎敌，被众迎头棍击，仆地就缚。其子佟丰年”后面为“其侄佟松年，及壮丁八十人”的记载。（贾乃谦点校，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7页）

⑤ 佟养真（正）次子佟盛年，满名图赖，生子国纲、国维，是康熙皇帝的母家及后家、清朝著名的“佟半朝”家族。佟家先从正蓝旗汉军被抬到镶黄旗汉军，又在编审册内改称满洲，却仍留于汉军旗下，成为一笔糊涂账。参见杨珍：《史实在清代传记中的变异——佟国纲、华善奏请改隶满洲考辨》，《清史论丛》2013年号，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3年，第73—99页；王成科：《以碑志为中心，谈明代辽阳佟氏家族》，《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13年号，沈阳：辽海出版社，2014年，第289—299页。

吴大斌在渡海登州前，先到了镇江。此时的镇江，正处在明朝与后金激烈争夺的风口浪尖，双方拉锯战如火如荼。风烛残年的吴宗道此后即不存于世，或当死于事变。吴大斌投奔吴宗道，至少说明他们之间维持着族戚之谊。吴大斌逃离辽阳、登陆镇江，与毛文龙所言“镇江避难人民，暗通镇江士庶，咸共响应”有何关系？吴宗道去世，镇江复陷后，出现吴大斌天启三年六月与朝鲜使臣李民成会面登州的场景。上文已述及，此处不赘。

要之，作为州山吴氏二支三分的穷宗吴大斌，带着兄弟子侄及部分族人前往辽东，通过未曾明言的吴兑这个靠山，结交宁远伯李成梁而得任东宁镇抚。但清代官书或方志，都失载吴大斌及族孙甥马骢等曾为明代辽东卫所武官的身份和事迹。而明代卫所系统，对清太祖的发迹起了重要作用：从建州左卫指挥使开始，努尔哈赤正是依靠明廷所赐的龙虎将军称号，得以收拾建州各部发展壮大。但这却是清朝统治者忌讳二百余年的话题和历史禁区，也是清朝历代掀起大案、要案以及禁毁书籍数量最多的一个主题。但凡涉及明末清初后金与明代关系的历史记载，包括明代卫所制与清代八旗制的关系、明代军民变身为清朝领属的经过等，都在禁毁范围内。正如上文论述的明“东宁卫镇抚”吴大斌，在清代官方、半官方记录中都被隐去。

其次，吴大斌浮海登州前曾投奔镇江吴宗道，这个细节也在私家谱传及官方半官方志书中失载，却由域外的朝鲜史料得以补充。吴大斌比吴宗道年轻但辈分大，谱传、行传中都没有记载其卒年。但他在登州以自尽开脱族人，族孙甥马骢等谋内应被东江叛将所杀等细节，都暗示州山吴氏与东江势力间的矛盾、冲突。下文通过考察吴宗道的族弟吴廷忠的经历，或许就能看得更清楚。

二、东江义士遗民吴廷忠

《州山吴氏族谱》中吴大斌亲侄吴廷忠的传记，显示了更多吴氏族人在辽东的活动轨迹。《葵赤公小传》略云：

公讳廷忠，号葵赤……时公伯父晴川公居辽，召公。公往，即命应清河试。入泮，旋补饩禀，尝以所学教授生徒，得宁、佟诸生数辈，肄其业，遂为兴朝从龙首彦。万历丙辰，会辽东失守，公等被俘，居常谓所亲曰：“人生不得行其胸臆，虽百岁犹为夭。吾属去父母之邦而栖魂异域，一朝奄溘，与草木同朽，宁勿有愧于心乎？”遂以计脱走，入海岛，谒毛帅文龙。

吴廷忠响应伯父吴大斌之召，前往辽东，得以“教授生徒”，或是教官或是私塾师，学生包括宁氏、佟氏等满汉弟子。如“辽阳人”宁完我，自天聪时已在文馆为“巴克什”，到顺治十五年（1658）九月以原衔少傅兼太子太傅、大学士致仕止，一直为内院大学士；^① 佟氏也是辽东著名的大家族。辽东失守后，吴廷忠“被俘”却以计脱走，也当受益于此。入海后，他投奔毛文龙时，吴大斌也浮海至镇江、登州。这对伯侄的命运，不仅因建州女真崛起而发生转折，也与毛文龙及东江事变息息相关。

崇祯三年，吴廷忠受明督师大学士孙承宗委派，到东江帮助游击周文郁安抚毛文龙被杀后的纷乱岛众：“周文郁入皮岛谕兴治，又督饷户部郎中宋献驻旅顺岛，谕各将安辑。承宗又遣诸生吴廷忠谕之，兴治等稍戢。”^② 作为孙承宗的使者，吴廷忠的善后工作取得一定成效。而在周

^① 《清史稿》卷232《宁完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359—9360页。

^② 谈迁：《国榷》卷91，崇祯三年四月，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5528—5529页。

文郁入岛之前，吴廷忠已在海岛活动多时，族谱记载了他投奔毛文龙却不为见重的细节：

时文龙数奏斩获功，朝野属望。公意其能建非常不世勋，惜文龙不能识公于牝牡骊黄之外，若伏波之于公孙述云，乃复弃去。诣阙下，会司礼监曹化淳奉使巡边，知公具戡乱才，熟边塞情，欲以总戎题请属公。公以进身阉宦为耻，勿就。时东事孔急，督师孙公元化、都督陈公洪范驻节东平，乃以公为幕府参赞。公倜傥好直言，不能附媚，浸亦不相得，时事渐不可为矣，力辞隐去。^①

逃出辽东后，吴廷忠曾投奔毛文龙。此时正值明清争战之时，急需用人的毛文龙却不待见吴廷忠，其中有何隐情？毛文龙与马骢的矛盾，似乎为我们破解毛、吴不谐提供了一丝线索。

天启三年五月，毛文龙报告欲约刘兴祚内应“计取南卫”的计划被马骢破坏：

广鹿岛游击张继善禀称：五月内遵谕驾船赴麻羊岛，候接刘爱塔，因约内应，计取南卫，却被山东加衔都司马骢、守备金应魁等，与金州民谋挖民间窖内银钱，因便欲拿贼成功，遂即上岸。别兵不知其情失备，被贼杀死一名，活捉四名，绑解辽阳。奴酋亲审四兵，招出刘爱塔归顺天朝、相约内应、恢复辽阳等情，将四人碎剐。

事情看起来很严重，因马骢谋取金州窖银、上岸拿“贼”之举，不仅牺牲了5位明军，辽南民众蒙受重大损失，而且刘兴祚内应反清之事也被暴露。至天启五年七月，毛文龙旧事重提，指控马骢，不仅是挖民窖银导致机密泄露，还有与后金的私下贸易：

臣自昔计授张盘恢复金、旅以来，每谓刘爱塔久有归心，因密嘱张盘潜为招接。不意被滑棍马骢挖民间所窖之钱，以致事泄，将臣数年心计大事，一旦败坏……迄今张盘已陷，张攀新至，马骢又连被相溷……奴自陷辽至今，已历五载，有花费而无出产，其最不足用布匹、棉花、绸缎、杂货。臣即奉旨招商，原为贍辽人以实军需，以我有余，禁彼不足，坐困贼奴，已得窘乏之策。奈马骢托守汛地之名，竟与往来，私相贸易，贪一匹布卖银五两，一匹绸卖银五十两，不顾中朝泄气。总之，金、旅之事，权不归臣，致使神奸得以乘间逍遥，泄我机关，坏我大事也。^②

毛文龙口中的马骢，是“滑棍”、“神奸”，与后金“私相贸易”。马骢的罪行与天启七年登莱总兵杨国栋弹劾毛文龙“采参、掘金，大肆扰害”及“私通粟帛、易敌参貂”、“通商接济事出权宜，坑商货至百余万”完全相似。^③可见，明军内部与后金方面私下往来的贸易行为并非罕见。^④这一方面说明双方的经济联系并未被割断；另一方面也说明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明军与后金方面是否存在私下交通，而在于由谁来做。双方背后的势力，当是马骢代表登莱方面，与镇守东江的毛文龙争夺战略地位，就像毛文龙与沈有容、武之望等登莱官员间的矛盾一样，都是争夺旅顺及“辽东半岛管辖权”的表现。^⑤但内情恐还不止于此。崇祯五年底，马骢在登州城内被孔有德等擒获后的死难，证明了他的人生大节，他用生命践行了对明朝的忠诚和无可怀疑的政治立场。这也反衬出毛文龙参劾他为“滑棍”、“神奸”，与袁崇焕后来参劾毛文龙密谋通清

① 《族谱》第30部，《叙传记·葵赤公小传》，第16—17页。

② 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2《天启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塘报》，第14页；卷4《天启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具奏》，第58页。

③ 《明熹宗实录》卷83，天启七年四月乙卯条，第4042页。

④ 参见赵世瑜、杜洪涛《重观东江：明清易代时期的北方军人与海上贸易》（《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一文中关注的长城内外以明军为中介的走私贸易，包括毛文龙的东江贸易及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金声桓等东江旧将清初在沿海地区的贸易走私活动。

⑤ 参见张金奎：《明代山东海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482页。

的手法如出一辙；而袁崇焕本人，最后也成为这种政治攻防术的牺牲品。

吴大斌与马骢的死难之间，似乎还贯穿着一条暗线。吴氏族人自万历初年即开始经营辽东，与李成梁家族的关系匪浅。万历三十三年，年已三十、因为伯父毛得春嗣子只身入辽的毛文龙，在他们的眼里是后来者。要想分得辽东一杯羹，毛文龙必须打破旧有的利益格局，新、旧势力的矛盾恐难以避免。自镇江大捷后，毛文龙的势头之盛一时无两，吴氏族人显然无能与抗。崇祯五年初，吴大斌以自尽换得族人生机，到马骢策划绑架孔、耿等失败被杀，似可看出在与东江势力的争斗中，吴氏族人一度处以下风。有了这些参照，吴廷忠不被毛文龙待见的原因，或可看得更清楚。虽然登莱、东江双方在对金政策、战略、战术方面存在分歧，但与后金的关系也有一致之处，即经济上私相授受、你来我往不绝如缕。

崇祯二年六月，毛文龙被袁崇焕诱杀于双岛，明廷欲迁岛众于辽。三年四月，刘兴祚之弟刘兴治叛于皮岛，督师孙承宗“遣诸生吴廷忠”谕刘兴治入岛。八月，已为刘兴治参谋的吴廷忠在小平岛与游击周文郁见面。其《边事小纪》略云：

初二日东风发，兴治又携酒诣余舟作别，令生员孙应科、参谋吴廷忠扶余于座而拜曰：“兴治久在夷中，未识朝廷法度，且误听小人之言，遂一时讎激。当日有教治抢朝鲜者、抢登州、据青州者，一闻开谕，如醉梦顿醒。公此来不特为兴治一家曲全备至，且救了多少性命，望公回关，始终成就，兴治死不敢忘。”余乃屏左右问曰：“所云抢朝鲜及抢登据青者是谁？”兴治曰：“游击龚正祥劝抢朝鲜，都司徐大复云当抢登据青也。”^①

崇祯三年，吴廷忠安抚刘兴治东江部众，这在州山吴氏《谱传》中也未提到。事实上，联系吴廷忠曾欲投奔毛文龙复弃去，到为孙元化、陈洪范参谋，亦不甚得志，他在东江活动前后长达一二十年之久，当有许多未发之覆。劝刘兴治抢朝鲜的龚正祥，正是与马骢同时殉难登州 16 将官之一，他与努尔哈赤身边的绍兴师傅龚正陆是否有族戚关系？^② 考察汉人在女真内部的生存、发展状态及其与登、辽、东江间的关系网络，加之与朝鲜、蒙古的牵连关系，正是明清易代史中的大难题。

崇祯十年五月，吴廷忠代表都督陈洪范接见朝鲜使臣李晚荣。他交待了五件事，第一件即“急送接伴使于岛中，使两国声息相通。而馆穀之事，督府自办，毋貽贵国之烦费云。其它皆同仇共耻、合力恢剿事也”。李晚荣记载：

吴赞画乃东征总兵吴惟忠之从弟也，居在浙江，陈都督辟为赞画也，似非寻常人也。说话间，赞画忧色满面，堕泪太息曰：“天朝贵国，即是一家。不幸天朝外有诸犍寇掠近甸，内有流贼窃据岩阻，贵国被祸亦如此，天下事能不痛心？”泪下如雨。^③

朝鲜使臣所谓“东征总兵吴惟忠之从弟”，与吴宗道称吴惟忠“家兄”一样，^④ 都是明末清初盛

① 周文郁：《边事小纪》卷 2《抚变》，《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年影印本，第 16 册，第 734 页下栏、735 页上栏。

② 朝鲜史学会国史编纂委员会编纂：《朝鲜宣祖实录》卷 73，宣祖二十九年三月十七甲申 3 条译官李亿礼书启，汉城：探求堂，1973 年影印本，第 22 册，第 661 页。日本学者和田清有《清太祖の顧問龔正陸》（《東洋學報》卷 35（1），1952 年，第 40—49 頁）、《龔正陸伝補遺》（《東洋學報》卷 40（1），1957 年，第 110—112 頁），对龚氏作了专门探讨；先师王钟翰也有《歪乃小考》，将歪乃断为人名而非职名（《王钟翰清史论集》第 1 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740—745 页），均向追索龚正陆的真相不断接近。而与马骢等谋为内应被杀的龚正祥与龚正陆或有亲族关系，俟考。

③ 李晚荣：《雪海遗稿》卷 3《崇祯丙子朝天录·丁丑五月》，《韩国文集丛刊》第 30 册，第 92 页。

④ 《朝鲜宣祖实录》卷 100，宣祖三十一年五月庚寅六日 5 条，第 23 册，第 434 页。

行的联宗表现。^① 吴惟忠是浙江义乌人，著名抗倭将领戚继光的故将；吴廷忠被称为“吴惟忠从弟”，从血缘上说不实，与其真正同宗的是吴宗道、吴有孚等人。

天启元年六月，在毛文龙获得“镇江奇捷”前一个月，明经略辽东督师大学士孙承宗曾派游击游士任招练淮兵，“同时有副总兵吴有孚及武举赵佑等，皆与士任深相结，并荐于朝，期以大将。”^② 吴有孚即前述与族叔吴宗道万历三十七年被辽东巡按熊廷弼弹劾削职的山东海防副总兵。十二年后，吴有孚再现政坛，时年 74 岁。

镇江恢复及再陷前后，吴氏族人纷纷活动，谋事或受命执行孙承宗、熊廷弼等恢复辽左、三方建置、联合朝鲜的策略，与登州武举游击赵佑、登、莱、天津等处监军御史游士任募练淮兵、监军道梁之垣出使朝鲜等桴鼓相应。天启元年八月，辽东经略熊廷弼疏言“三方建置，须联合朝鲜”，改辽东南路登州籍监军道梁之垣为行监军道，以其生长海滨、习知鲜辽形胜与民情土俗，派往敕谕朝鲜君臣，谋使发兵与毛文龙“援助有济”。^③

陪伴梁之垣前往朝鲜的辽东“马都司”，即吴宗道的外甥马骢，《明实录》失载，却得到朝鲜史籍的补充。马骢主持与朝鲜的谈判事宜，实为萨尔浒战役后，明朝联合朝鲜、复兴辽左的再次尝试，却未成功。^④

天启六年八月，赵佑死。朝鲜传言为毛文龙所杀，而袁崇焕斥毛“十二当斩”只言其杀降，也未落实此事。赵佑、梁之垣、马骢诸人，均为明朝兵部三方联络计划的执行者，代表登州方面，投奔吴宗道的吴大斌，与执行孙承宗路线的吴廷忠、吴有孚均寓登州，当与熊廷弼的路线并无二致，却与开镇东江的毛文龙实在有隙，吴廷忠投奔毛文龙不受待见，吴大斌以死脱困族人，乃至马骢密谋不成反被孔有德等杀害，都显示抗金势力的内部矛盾，称登州派与东江派矛盾也好，称吴氏家族与毛氏家族（包括异姓部将）的矛盾也好，都显得难以调和。钱谦益后来回忆这段时期，曾大发感叹：

天启元二，东事方殷。缙绅林韦，云集阙下。猎纓侧弁，而谈兵事。词垣则徐子先、顾九畴；卿寺则董见龙、刘梦胥、何天玉；台谏则游肩生；部郎则王季木、曹元甫；贵介则顾所建、茅止生、刘晋仲、翁孝先；布衣则孟羽尼、张任甫、金太初、胡敬仲；靡不骨腾肉飞，肠肥脑满……期生少年金吾子，飞扬征逐，家世将坛，谄晓表饵，方略矢口，奋臂猎猎。然风生焰发，何其壮哉！迄今三十年所，星回物改，畴昔高谭阔步、请纓说剑之流，皆已化为碧血，漫为黄土。惟晋仲不知其存否？敬仲已作盲老，公余与提督皤然笃老，期生亦发种种矣。^⑤

其中提到的“期生”，是指吴兑曾孙、有孚长子孟明的次子国辅（出继孟明弟孟益为嗣）。吴孟明自万历四十六年京卫武举，袭祖荫锦衣卫正千户，考选北镇抚司理刑，升指挥僉事。为营救楚人胡敬仲，触怒魏忠贤遭削籍。崇祯改元起补南镇抚司掌印，升堂上僉书，再掌锦衣卫事，曾通过曹化淳营救以枚卜事入狱的钱谦益、瞿式耜，终以郑鄮之事忤温体仁遭解职，时为崇祯

① 何龄修在《清初京师吸烟风等问题》一文中，提到吸烟风、吃喝风、人市和联宗等问题。（《五库斋清史丛稿》，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718—738页）

② 《明熹宗实录》卷11，天启元年六月甲戌，第547—548页。

③ 《明熹宗实录》卷13，天启元年八月庚午朔，第637—638页。

④ 参见拙文《东征故将与山阴世家——关于吴宗道的研究》“余波”部分（《纪念王钟翰先生百年诞辰学术文集》，第171—173页）；《朝明军事合作计划及其执行者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5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27—480页。

⑤ 钱谦益：《期生金吾小传》，《族谱》第30部，第25页。

十五年。顺治十年卒，享年八十。^① 孟明弟孟登（即朱赓女婿）之子邦璿，易代之际随朱大典抗清于金华，阖家死难。^② 孟明妹嫁李成梁第三子如桢之孙李述祖，诒赠孺人。^③ 山阴吴氏与辽东李氏的姻亲关系得到证实。

吴廷忠当即借助族孙吴孟明在锦衣卫的地位，与司礼监曹化淳往来，至拒绝其“总戎”的题请，或与崇祯末年吴孟明的失势有关。总之，启、祯之间，吴廷忠往来东江、山东、京城，风尘仆仆二十年，期待有所作为，却以时势日非不得施展，正是钱谦益所谓“化为碧血，漫为黄土”的那些往事。明清易代之后，吴廷忠归乡，《谱传》载：

迄兴朝定鼎之初，始归里，年已六十，自伤衰老，不得一展其胸臆。痛悼故君身殉社稷……足迹不出里门，口不谈当世事，日以诗酒遣怀。丙戌，公之门人完我宁公居端揆，访求公迹于东鲁、闽、浙间，勿能得。至是始知旋里，命抚军萧公致书币迎公，公坚卧勿起，却其所遗，终不肯以刺通……猷生也晚，然犹及仰亲叔父颜色，周旋阙里，聆教言如一日。^④

传文作者是吴廷忠之侄树猷，至亲时近，所言可信度较高。奔波一生的吴廷忠无嗣，娶项里韩氏，鼎革之初“年已六十”，他生于万历辛卯年，至少活到顺治八年。身后以侄应时（三兄存忠之子）继嗣；又以从弟、曾为榆木岭提调、辽东军前赞画的吴大武之子禹道与陆氏妾所生子登元为继子。^⑤ 顺治三年，辽东旧门人宁完我遣人寻师及浙江巡抚萧起元书币聘请之际，吴廷忠才55岁。他的一生，从应伯父吴大斌之召入辽开始，至明清易代后回归山阴为遗民终止，早期辽东生涯与中后期东江奔波，都与明清易代史事密切相关。

其一，吴廷忠为辽阳宁完我、佟氏等满汉生员的启蒙老师，与努尔哈赤家中的绍兴师傅龚正陆相似，都是辽东地区绍兴籍教师的代表。与来自其他地区的卫所教授，^⑥ 构成了辽东的知识传播者，也是当地满汉子弟文化知识的源头之一。这对认识清初满族贵族的文化渊源及旗人汉化进步的速度都有较大的帮助。

其二，透过易代前吴廷忠在辽东、东江、登州及京城等地的活动，以及吴氏家族包括吴大斌、族外甥马骢与毛文龙之间的矛盾，不仅折射出明朝内部多股政治势力间的复杂斗争，也反映了明朝与后金间难以割断的经济文化联系。

其三，吴廷忠受孙承宗委派，前往东江安抚刘兴治，还试图与阉监曹化淳交往谋事，至参赞孙元化、陈洪范幕府，与朝鲜使臣交涉，都显示吴氏族人与易代史事相涉之深，还有诸多深究余地，而不仅仅是鼎革后谢绝外事、保全义士与遗民这双重身份。

① 吴兴祚：《祖洲大金吾传》，《族谱》第30部，第19—22页。

② 《族谱》第30部《都督吴公乾则暨傅夫人合传》，第27—28页。

③ 李树德修撰，李泽棉校订：《李氏谱系》，辽宁：铁岭市博物馆，1991年，第19、28页。李述祖卒时年仅23岁，所娶吴氏为“锦衣卫大堂兼太子太保吴公孟明之妹”，当为李如桢（？—1631）为锦衣卫大堂掌南北镇抚司提督西司时所缔结的姻亲。此材料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靳大成研究员借示，特此致谢！

④ 吴树猷：《叙传记·葵赤公小传》，《族谱》第30部，第16—17页。

⑤ 《族谱》第20部《二支三分四至九世·八世》，第42、43页。

⑥ 黄一农教授考证曹雪芹先祖曹锡远之子曹振彦出身“教官”，正与吴廷忠、吴大圭“教授”清河同途，唯以“致政”为“职位”值得商榷。若深究曹振彦如何由“致政”解除“教官”之职转为“旗鼓牛录章京”，或许可挖掘出更多的历史隐秘。参见氏著：《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第25、27、35页。

三、正红旗下的吴大圭吴执忠父子

吴大圭、吴兴祚祖孙隶属正红旗下，是吴氏族人中最富戏剧性的经历。吴大圭是吴大斌的幼弟，其后人不仅与吴宗道、吴有孚叔侄不同，更与吴大斌、吴廷忠异帜，成为第三类山阴州山族人，即“辽人”中的八旗奴仆。同胞兄弟从此分道扬镳，子孙后代命运判然有别。

州山吴氏第六世吴论生大斌、大益、大圭三子。长子大斌率三弟大圭到辽东闯荡，二弟大益居家侍母，其所生四子宗汉、成忠、存忠、廷忠，也都随大斌入籍辽东。大圭生二子景忠和执忠，执忠长子吴兴祚，即清初著名“辽人”督抚，为清廷平定东南沿海的郑氏武装，夺取福建、台湾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的出身在清史资料中扑朔迷离，只在族谱中留下了蛛丝马迹。

吴执忠《匪躬公自序》云：

先考越川府君明季随征关白，因家辽阳。执忠束发即事太祖、太宗于奉天。逮世祖皇帝受命，宅定区宇，从龙翊运，遂荷简拔，顺治初宰于顺天之丰润。嗣蒙宸眷，擢任西台，出为漳南布政司参议，卒役，复迁山东按察司副使。越二祀，仍有楚藩参政之命……窃恐数世而后子孙不能典守，或致沦没，后裔罔闻。谨以敕命制诰附梓谱末，垂之无穷……实康熙四年乙巳嘉平八世孙执忠顿首拜述。^①

从中可知康熙四年（1665）吴氏家谱重修，吴执忠作序。清初内院翰林黄机撰《中大夫湖广粮储道布政司右参政匪躬吴公墓志铭》也提到：

公先世本籍山阴，与余为桑梓，且通门旧谊……公讳执忠，字匪躬，自始祖慎直公迄六世，皆为绍兴山阴之州山里人，相传为季札裔。五世处士佑，号履素……公之曾大父也，佑生论，论生大圭号越川，明世庙时，以千夫长领兵随征关白，是为公考，寓籍三韩，盖自越川公始……公少颖悟，多读书。岁乙卯年十四甫游于庠，而我太祖武皇帝师克清河，公时方冲龄，器宇明敏，胆识过人。太祖见之色喜，命侍亲藩，佐理庶务……旧有流离散亡者，公咸收恤之，仰食于公者数十余家。其子若孙多冠裳接踵于朝，其最盛者辛高二氏焉。^②

越川公吴大圭万历年间为东征朝鲜的千总，东征结束后留居辽东。“三韩”为辽东别称，州山族人“寓籍”辽东，大圭兄弟子侄为一大支。

大圭孙兴祚的《谱传》多了一个细节：“公姓吴氏，名兴祚，字伯成，号留村。其上世居山阴之州山里，为通门右族。祖大圭教授辽东之清河，值太祖龙兴，遂隶籍正红旗下。”^③可见，东征千总吴大圭归国后，成了清河教授，与侄廷忠同途，正是卫所系统的文职。万历四十六年七月，清河被后金兵攻占，改变了吴大圭一家的命运，兴祚父子正红旗下的生涯就此展开。

清河陷落的经过见载于《满文老档》：

（天命三年）七月二十日，出兵攻清河。未时天雨，至夜天晴。二十二日，围攻清河城。城内一守城游击率兵五千及地方兵五千固守，并有大小枪炮一千二百。其万余兵箭射、刀砍、枪刺、掷石，又以千余枪炮齐发，但未闻其声，遂破城而入，尽杀其兵……城既克，驻四日，以分俘获……驱辽东，宿二日后，明使李参将等五人至，彼等终无修好之意，故未令遣还。^④

清河守军因下雨火炮弹药受潮，抵抗失败。陷落之际，万余明军被杀或被俘。后金兵驻师边内

① 《族谱》第3部《修谱记叙辩》，第26页。

② 《族谱》第31部《赞状志表》，第67页。

③ 《族谱》第30部《都统前总督两广兵部尚书留村吴公传》，第16页。

④ 《满文老档·太祖》，天命三年五月至十二月，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册，第65—66页。

13日,花4天分配俘获人畜,尽迁辽东。谱传的作者避重就轻地记载时满17岁、已为庠生的吴执忠,因得努尔哈赤喜爱,被分置正红旗下,佐理亲藩庶务,实际上即为奴仆。正红旗旗主是努尔哈赤次子代善,也是清太宗皇太极的兄长,天聪、崇德朝为四大贝勒之首,被称为大贝勒。吴执忠服务代善府第达十余年,直到顺治四年以贡士身份就任丰润知县,这或许是他能够庇护故人辛氏、高氏家族的资本。但执忠之父大圭的结局,清代官方史料中均不见提及。

《族谱》也仅记载吴大圭葬在清河:

大圭,字叔晋,号越川,行秀七十四,通行会五百四十八,嘉靖乙丑三月廿一生,娶在城王氏,生子二:景忠、执忠,女二。随征关白,领兵千总,升清河卫守备,升盖州城守尉。以子执忠贵,敕赠文林郎顺天府丰润县知县,王氏封孺人……卒,葬辽东清河卫威宁营东北五里,坐北向南。^①

这里有二处异样:第一,缺载吴大圭教授清河之事。东征归国后,大圭升任清河卫守备、盖州城守尉,而吴兴祚《谱传》则记载大圭“教授清河”在“太祖龙兴”前。他是如何从一个卫所武官变身文职教授的?第二,吴大圭的卒年空缺。大圭子执忠曾主持编纂族谱,为何坐视生父卒年空缺?作为“辽阳清河卫庠生”,不会不懂修谱规矩。那么,除了忌讳记载这个年份之外,似乎找不到更好的解释。

无独有偶。执忠之兄景忠的卒年也付诸阙如。从生年推断,清河沦陷时,景忠正好二十岁:“景忠……万历己亥九月初二生,卒葬辽东。”^②这些特别的隐晦和空缺,暗示了大圭父子死于清河城破。大圭幼子执忠被俘为奴,这才是清代八旗里出现一支山阴州山吴氏族人的真相。故黄机撰写吴执忠墓志铭时,故意模糊事实:第一,清河城破,吴执忠被俘;第二,幸免被杀,被分置正红旗下为奴,满文称“包衣”。故官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出现了一支世居铁岭的“辽人”吴氏:

吴伦,正红旗包衣人,世居铁岭地方。国初来归,其子达奎原任千总,达益原系生员,孙治忠原任湖广粮道,成忠原系举人。曾孙吴兴祚于福建巡抚任内平定海寇有功,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任两广总督。卒,其孙吴义增袭职,现任散骑郎兼参领。^③

这里赫然记载吴兴祚的曾祖吴伦是正红旗包衣人,世居铁岭地方!如果没有族谱可资对照,又有谁能看得出来其中的奥妙呢?

《族谱》记载吴伦行传如次:

伦,号守庵,行相三十三,通行序百三十八。正德丙寅八月初七日生,娶梁枋通判秦偃女……生子三,大斌、大益、大圭……卒年六十五,葬宋家山。^④

吴伦生于1506年,享年65岁,则卒于隆庆四年(1570),葬地宋家山,在山阴“本里”,当时他的子侄们尚未涉足辽东。

那么,问题来了:世居绍兴、安葬山阴故里的吴伦,是如何变身为清朝“国初来归”的正红旗包衣人“吴伦”,又如何在死后多年被隔空挪移到东北铁岭的呢?考察这个过程及其背后隐含的历史信息,或许更有意思。

乾隆九年,清廷纂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与国史相为表里”,将从龙附凤之众“入我朝来得姓所始,表之以地,系之以名,官阶勋绩缀为小传”,以表彰“祖宗德泽之深,不

① 《族谱》第20部《二支三分四至九世·七世》,第17页。

② 《族谱》第20部《二支三分四至九世·八世》,第42页。

③ 清乾隆九年敕撰:《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74《吴氏》,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第456册,第310页。

④ 《族谱》第20部《二支三分四至九世·六世》,第8页。

可不继”，^①以凝聚旗人作为国族的“满洲”意识，塑造满洲认同感，是当时倾力打造的一项“国家工程”。^②如此形势下，故国家园既不能提起，又要具备厕身旗下的本根初源，显然是摆在“现任散骑郎兼参领”吴兴祚孙吴义增面前的一道难题。面对现实，顺应时势，编造一个大致符合规定的祖宗，安排在辽东早期的落脚点，或许是他当时唯一能做的。虽然山阴故籍与铁岭关山千万里，州山五世祖吴论也与正红旗包衣人风马牛不相及，但至少四世祖吴大圭葬地清河，属铁岭。变通的编造得到了官方承认。于是世居山阴、葬于“本里”宋家山的五世祖吴论，变身为“世居铁岭地方”的“吴伦”，被收入《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四世祖大圭变身为“达奎”，万历年间明军东征“千总”的身份也被模糊处理；伯高祖大益成为“达益”，曾祖以下名各有差，鱼贯入旗。如果没有《族谱》为对照，世人如何得知这个“世居铁岭”的辽东家族，乃是从浙江绍兴暗度陈仓而来？吴大圭，这个明朝的东征千总、清河卫守备、盖州城守尉、清河教授，在死去多年后，竟因幼子吴执忠被俘幸存，被改头换面，成为了满洲正红旗包衣人。^③

由此我们不禁想到：《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到底有多少这样编造的成分？我们利用史料时，又是多么容易陷入泥沼！卷72、73《附载满洲旗分内之高丽姓氏》均来自朝鲜，卷74至80中883个“附载满洲旗分内之尼堪姓氏”也都各有来处，“来归年分无考”的有749家，其中84%“世居”沈阳，“不应径谓其籍贯皆为沈阳”，正因另有乡贯故里，其余“世居”辽阳、抚顺、铁岭的均是如此。其他尼堪（汉）姓，无论是早期的抚顺尼堪、台尼堪还是稍晚的北京尼堪、三藩尼堪等，都大有深究余地，却多因子孙不显，最后均泯灭无闻。

吴执忠（1602—1675）“字汝璽，号匪躬……娶辽东东宁卫指挥使孟德春女，生子一兴祚……卒年七十三，葬京师平子门外龚村”。^④吴大益留在山阴养亲，其四子均随叔、伯入籍辽东。吴执忠墓志铭还记载：

推惠宗党，尤竭诚爱。常自以生长于辽，念及祖居，则黯然而叹。初入关即访招族侄，至是宦成，亟游越里。扫封茔，仰堂构，历询耆旧故事，登陟先人钓猎遗址，低徊留之……本支之谊，蔼如更多。助给嫁娶丧葬之贫者，今伯成之于族谊特殷也，实推广于公之遗念云。从兄有三孤，公为衣食教训婚配之，及其孙亦一体抚鞠，皆恃以成立。^⑤吴执忠抚养从兄“三孤”即吴大益之孙。大益四子宗汉、成忠、存忠和廷忠，除老三存忠未得功名，宗汉、成忠为自在州庠生，廷忠为清河卫庠生，都取得了初步功名。而宗汉、存忠卒葬辽东、清河，均死于城破；成忠、廷忠与伯父大斌逃生，卒葬登州；归葬山阴的唯有廷忠，卒年当不止59岁。存忠子应昌、成忠子兴宗与兴祖，即吴执忠抚养的“三孤侄”，均仕宦于清。^⑥

① 《御制〈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5册，第1页。

② 欧立德揭示了清廷为塑造满洲民族意识、满洲身份认同感，以创立旗制、使用满语、骑射、诗歌、编整宗教礼仪（如《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满文大藏经》）及历史资料（如《满洲源流考》、《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等方式进行，参见氏著：《乾隆帝》第四章《满洲成功的困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0—97页。

③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74—80中，未注明身份的原“千总”有5家，原“总兵官”1家；原“副将”2家，原“都司”1家，原“守备”1家，原“把总”1家，都应是明军被编入八旗包衣留下的痕迹。（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6册，第333—391页）

④ 《族谱》第20部《二支三分四至九世·八世》，第42页。

⑤ 黄机：《中大夫湖广粮储道布政司右参政匪躬吴公墓志铭》，《族谱》第31部，第71页。

⑥ 参见《族谱》第20部《二支三分四至九世·八世》，第42—43页（页42b载廷忠“卒年五十九”不确，前引树猷所作传言其定鼎之初“年已六十”）；金之俊：《皇清诰封孟淑人墓志铭》，《族谱》第31部，第78页；《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6册，第310页。

实际上,州山吴氏入籍辽东者不止吴论这支。如曾为榆木岭提调、后为辽东军前赞画的吴大武,为吴论弟吴谔之子,其子吴登元后为从兄吴廷忠继子。可见州山吴氏在辽东铁岭、清河、辽阳、盖州、镇江等地聚集族人为数不少,终因易代流离失所。作为闯关东的领头人,吴大斌率幼弟大圭及数侄入辽,改变了家族成员的命运。但清河大圭父子死难,幼子被执为奴,苟活旗下,却得孙辈吴兴祚在易代后崭露头角的机会;而大斌、廷忠叔侄逃出辽阳,浮海镇江、登州、东江等地,为明朝遗民,州山族人的命运也就此分途。

四、清初著名督抚吴兴祚

明清鼎革之后,州山吴氏族人中最为著名的吴兴祚,凭借在东南沿海与郑成功武装抗衡立下的汗马功劳而获得清廷“超擢”,成为旗下新贵。山阴世家的南北渊源本因易代斩断,却因兴祚得以接续,这即黄机所说“寓籍三韩,盖自越川公始”的另一面真相。

吴兴祚,字伯成,汉军正红旗人,原籍浙江山阴。父执忠,客礼亲王代善幕,授头等护卫。兴祚自贡生授江西萍乡知县……旋以守御功授山西大宁知县,迁山东沂州知州。白莲教啸聚为患,兴祚开谕散遣之,复坐事降补江南无锡知县……康熙十三年,迁行人,仍留知县事。用漕运总督帅颜保荐,超擢福建按察使。^①

从无锡知县骤升福建按察使,吴兴祚被认为是清代的特例:“洪承畴以内阁经略五省、吴兴祚由知县三年升总督,皆异数。”^② 清末陈康祺也关注过吴兴祚由“知县骤升臬司”的异状。^③ 帅颜保是清初内院大学士希福的次子,康熙初年超授内国史院学士,历仕吏部侍郎、漕运总督、工部、礼部尚书。十二年任漕督时,疏荐山东粮道迟日巽、河南粮道范周、无锡知县吴兴祚等。^④ 希福家族与州山吴氏的深层关系待考,但仅凭此,似不足以解释吴兴祚骤升的内因。出任知县前,吴兴祚为贡生,父执忠曾任福建漳南道、湖广布政司参政,“尝以两昼夜成布囊万余”飞挽供应前线,“功之在闽楚者,不必汗马挥戈”,^⑤ 仍未得大用。

康熙十五年十一月,是吴兴祚“异数”历程的起点:从无锡知县特擢福建按察使,参与平定东南沿海抗清势力。在平定江西贵溪明朝宗室宜春王朱统𣪠叛乱时,“吴兴祚设计遣投诚总兵蔡淑佯回贼营以作内应”,^⑥ 瓦解其军,谋略初显。至康熙十七年,擢任福建巡抚。时福建总督姚启圣,为吴兴祚的绍兴同乡且极有个性,史载其胆大妄为至“擅开海禁”。^⑦ 从“强海商填库”^⑧ 到“借帑外省贸易”,他与吴兴祚配合默契。姚启圣曾疏言:

臣于康熙十七年十月进兵至凤凰山,因一时投诚者多,犒赏不继,与抚臣吴兴祚议及外省贸易,颇有微利,前督臣李率泰、经略洪承畴曾借帑为之,遂冒昧上疏,未蒙俞允。臣自入仕,京师未有产业,而军前捐银十五万有奇者,香山罢官后,贸易七年,得积微资,

① 《清史稿》卷260《吴兴祚传》,第9862—9864页。

② 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6《焚麈寄·科名》,《四库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子部,第155页,第237页上栏。

③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初笔卷2,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8页。

④ 《清史稿》卷232《希福子帅颜保传》,第9348—9349页。

⑤ 黄机:《中大夫湖广粮储道布政司右参政匪躬吴公墓志铭》,《族谱》第31部,第69—70页。

⑥ 《清圣祖实录》卷64,康熙十五年十一月丙申,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822页下—823页上;福建巡抚杨熙疏报,《清圣祖实录》卷69,康熙十六年十月丁未,第886页下。

⑦ 《清史稿》卷260《姚启圣传》,第9857页。

⑧ 李恒辑:《国朝耆献类徵初编》卷159《疆臣十一·姚启圣》,清乾隆刻增修本,第26b—27a页。

并臣浙江祖产变价及亲朋借贷，经年累月而后有此。^①

姚、吴曾商议步武李率泰、洪承畴，利用官帑贸易获利未得允准，但姚启圣罢官后，兴贸七年，积资变价，仍投入身家性命与清朝绑在一起。吴、姚二人即清廷所得绍兴世家襄助的缩影：不仅是拥有他们的财富及社会关系，还有捐生弃命也在所不惜的依附。

时郑锦在台湾，遣刘国轩围攻福建漳州、泉州等地，吴兴祚以标兵赴援，募水师与战。次年，合姚启圣兵再战郑氏水师，修理战舰 250 艘、督造乌船、齐集江南炮手，并请“令浙江督抚、发标兵二三千人固守延平要害”。浙督李之芳、巡抚陈秉直遂抽浙兵赴闽，更募“资力壮健兵丁五千”补隶浙营。^② 注重水战，借力乡党，吴、姚搭档，堪称绝配。而这正是满洲八旗军队的短板。他们采用福建漳浦人黄性震的“修来”法，对郑氏武装进行釜底抽薪：“建立修来馆，以收纳归诚将士来降者。无真伪，胥善待之；夏屋美衣，车马仆从，炫耀街衢。由是，海上诸党多潜来归顺。”可授实官，使至者如归。得海上间谍，悉厚赐用侦海事，以反间致其“自相疑贰，来归者日益众。一鼓而平十九寨，复海澄，克厦门、金门”。^③ 郑经的五镇将黄靖、廖屿、赖祖、金福、廖兴降，以及林麟、詹天枢、陈彬、郑奇烈、林翰等亦先后投降。康熙十八年八月，吴兴祚疏报招抚郑氏总兵蔡冲琬等 3 员、官员 85 名、兵丁 12517 人，召回岛民 3190 余名，共获大小船 67 只，分拨水师营用。^④ 次年，再疏台湾“逆党”刘天福率众投诚，和硕康亲王杰书也上疏言闽、浙、赣三省之害已去，乃因“今福建巡抚吴兴祚等宣示招抚，江机等率领伪官”1138 员、兵丁 43629 名投诚，各分别归农补伍。^⑤

吴兴祚和姚启圣风雨同舟，“以乡里交欢，指画军事如桴鼓”。当漳、泉被围时，兴祚赴援，带着“西山降众佐以募卒、材官、家僮”，乘间趋兴化；抵白鸽岭，恢复永春、德化诸县，并密疏请制乌船，自制八浆船，联络沿海渔户，“不惜金钱官爵牢笼”郑氏官兵，不等荷兰夹板船至，先行攻克厦门，立下大功，又“与总督姚公合宣露布，而归美于亲王将军以下”，使得康熙帝龙心大悦，晋秩兵部尚书，予以世荫。他乘胜直捣台湾疏被部议阻格，得迁两广总督，“后一年，遣将军施琅取台湾，悉如公策”。^⑥

即使“归美于亲王将军”，吴兴祚的功绩依然抢眼：“进剿海贼一案，原系吴兴祚、万正色会同定议，不俟荷兰国船只，即奋勇前往，志靖海氛。万正色领水师先行出洋，吴兴祚率陆兵，互为声援。驱除海逆，克奏肤功。”^⑦ 姜垚表彰乡里诸贤：“吾越固多伟人杰士，其在本朝扈从入关者有沈文奎、姜新诸公。今上继统，翦逆乱清海疆，则有吴兴祚、姚启圣，同时奋起，为国桢干。而吴公更忠雅慈惠，朝野莫不欲瞻其颜色，卒以尽瘁疆场，竟其素志。”^⑧ 清初平定东南沿海，借大力于当地士绅，一些被纳入旗下、却仍扎根故里的世家子弟，个人才干突出、家族财力充裕，职品却很低下，被超擢后，充分挖掘出自身乃至整个家族的潜力，表现了惊人的社会动员力，为清朝建立及巩固鞠躬尽瘁。吴、姚二人实为典型代表。

① 《清史稿》卷 260《姚启圣传》，第 9859—9860 页。

② 《清圣祖实录》卷 86，康熙十八年十一月壬子，第 1094 页下；卷 75，康熙十七年七月辛酉，第 967 页。

③ 蓝鼎元：《黄太常性震传》，钱仪吉：《碑传集》卷 41《内阁九卿》，《清代碑传全集》缩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216 页下。

④ 《清圣祖实录》卷 83，康熙十八年八月癸酉，第 1058 页下。

⑤ 《清圣祖实录》卷 90，康熙十九年六月丁卯、甲戌，第 1149 页下、1141 页上。

⑥ 以上未指明出处者均见姜垚：《都统前总督两广兵部尚书留村吴公传》，《族谱》第 30 部，第 17—20 页。

⑦ 《清圣祖实录》卷 94，康熙二十年二月庚寅，第 1189 页下。

⑧ 姜垚：《都统前总督两广兵部尚书留村吴公传》，《族谱》第 30 部，第 20—21 页。

康熙二十年,吴兴祚擢两广总督;二十八年,被劾“鼓铸浮冒”黜职;^①三十一年十二月,设右卫驻防,兴祚任右翼汉军副都统;三十四年六月,与右卫将军希福等同被疏参;次年随征噶尔丹,效力坐塘沙克所;三十六年奉旨复原官,二月病卒,终年67岁。显然,吴兴祚积极参与平定三藩的政治立场,才是“圣祖破格登庸,以七品卑官骤迁宪长”的根本原因。^②

至于后人所谓的“清操俊节”,^③则为观察吴兴祚提供了另一个角度。

吴兴祚为无锡知县时,“前官亏帑金不得归者三人,役之在狱者三十余人,公慨然力为补苴请豁,官得归,役得出狱”,都将他看成再生父母。他的财产来源似成一个谜团:“族人至其治者踵相接”,而他“十余年如一日”,无论宗支戚疏,“必使称愿”;特简入闽后,族人“至闽者不减于锡”;节制两粤时,为免族人长途跋涉,“计贫乏者数百余家,差之以三等,约所惠者七千余金”,尚不包括汲引奖借宗人、纳贐通籍所费之数。^④最后还被誉为“清贫”。

周济族人固然导致其“清贫”,但前提还须是多金。从无锡到福建、两广,跟从吴兴祚讨生活的族人规模庞大,甚至可组织起来与抗清武装对抗。吴兴祚如何能做到“贍给宗党不下数万金”而达到收支平衡呢?^⑤或许在清初,旗、民间的经济地位差异巨大,汉人眼里“清贫”的低级旗员,也比普通民众生活水平高出甚多,故七品知县吴兴祚尚有余力周济族人。其次,江南无锡知县与偏远地区知县,掌握的财权或大有区别。更重要的,山阴吴氏家族向来注重贸易,^⑥无论是吴兴祚因地制宜的建议,还是与“海商”间存在想象余地的关系,^⑦都显示他理财能力突出。或许是另有财富来源(如《清史稿》所揭与白莲教的关系),可维持其清雅生活:

伯成风致甚俊爽,出则重髯吹螺,大帅戎服,帕首袴鞬,以威见惮;入则衣轻衣,从小僮二,怀铅提槧,与骚人雅士酌酒分韵。^⑧

吴兴祚尤好填词,如《留村词》入选聂先《百名家词钞》,《踏莎美人·送顾梁汾之江右》、《题王右丞初冬欲雪图》等入选蒋景祁《瑶华集》,《送孙恺似孝廉》入选《清诗别裁》,还著有《宋元声律选》、《史迁句解》、《粤东舆图》等。沈德潜谓其籍辽东清河,本贯浙江山阴,却略而不提旗籍;^⑨而福格所谓“吴兴祚,汉军正红旗人”也不确。^⑩清朝内务府、王府包衣,与八

① 《清圣祖实录》卷141,康熙二十八年六月戊子,第549页。

②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二笔卷6《吴兴祚之治行》,第436页。

③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二笔卷6《吴兴祚之清贫》,第436页。

④ 姜希辙:《贍族碑记》,《族谱》第30部,第1a—2b页。

⑤ 《族谱》第30部《都统前总督两广兵部尚书留村吴公传》,第21页。

⑥ 吴兑家族未遂的军需生意如万历十年七月企图卖布与兵士,“扣月粮为价”(金云铭:《陈第年谱》,台北:大通书局,1977年,第49页),以及“装送兵器、火器赂俺答”(《明神宗实录》卷132,万历十一年正月癸酉,第2460页)。其“岁装送北虏金缯之属数百扛,以求不犯;推补参游等官将缺之善否,定价有差”(《明神宗实录》卷135,万历十一年三月甲辰,第2525页),都说明贿赂卖官与贸易求财是其一贯行径。他被准予致仕,经济问题为大端。其嫡子吴有孚及吴宗道被撤职,也被熊廷弼从经济问题入手抓起。

⑦ 除吴兴祚、姚启圣合谋以“海商”清偿欠款事外,兴祚任两广总督期间,仅在澳门“旱路界口”的“自由航海及粤澳贸易”一年税银及“私抽”就达2万两左右(转引自汤开建:《清朝初期澳葡政权的走向及与清政府的关系》,高伟浓主编:《暨南史学丛书·专门史论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29页)。吴兴祚还在广东、广西设炉鼓铸,被劾“鼓铸浮冒”后调用副都统,也可为其理财能力作注脚。

⑧ 鲁曾樱节录:《康熙朝督抚·两广总督吴公兴祚传》,钱仪吉:《碑传集》卷64,第325页下。

⑨ 沈德潜选:《清诗别裁》卷13,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102页。

⑩ 福格:《听雨丛谈》卷3《八旗直省巡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8页。

旗汉军分属两个系统,^①而清承明制的线索,则系于明代卫所制与清代八旗制间的关系:内务府、王府包衣及八旗汉军成员,大都是原明辽东卫所制下的官兵及其家属,以旧酒灌装新瓶产出新品,无论是吴大圭祖孙,还是范、佟、李等著名八旗汉军家族,均是如此。

因此,吴兴祚的“超擢”和“异数”,首先得益于他鲜明的政治立场和积极的军功建树,这是他谋求经济利益的前提;而他的包衣身份,也为他提供了特殊的便利。作为正红旗王府管家之子,吴兴祚就任两广总督的肥差也是一种酬报。而旗员须为旗主执役,更是清初八旗制的突出特点。其他如浙江平湖入陆葵,在易代之际“为镶黄旗带子阿什兔所俘”,时年十四,遂认“阿什兔主人”即八旗固山“诚顺伯”马光远为父。三年之后,其亲生父亲“亲诣诚顺伯里第,乞放公归”并纳“赎百镫”,陆葵始得归里。^②陆葵后改名陆世枋,补平湖诸生,考取清内弘文院办事中书舍人。当主人寝疾时,还须自三千里外往赴“为侍汤药,奉含殓,疏麻服丧……躬亲送死”。^③除所谓的天理人情之外,实受一日奴、终身仆的旗制制约。康熙十七年,中式博学鸿儒科的陆葵,得授翰林院编修、充明史纂修官,回忆这段囚服燕台的经历,他仍称为“泣血”。可见,即使高价赎买也免不了主奴义务,这才是历史真相的另一个侧面。

论在旗资格,吴兴祚比陆葵老得多。但无论是封疆大吏,还是神童文胆,均摆脱不了同为旗奴的禁锢,这种既有便利又受压抑的身份,大概也是吴兴祚对待族人满腔热情的一个内因,更是鼎革之际由明入清汉家子弟的共同命运。

结 语

明清鼎革之际州山吴氏族人的经历,多角度多层面地揭示了这个世家大族的诸多成员,在风云激荡的纷乱世变中跌宕的命运与复杂的结局。

首先,以一支大分的吴兑、吴有孚父子为中心,联系二支三分的吴宗道,看吴大斌、大圭兄弟子侄及孙辈兴祚,三代人的际遇有云泥之别。被政治背景强行割断的历史渊源,却因血缘关系得以连缀、接续;而私修家谱及域外史料,在弥补官方叙述中被掩盖的历史联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由此,我们可以透视明代卫所制与清代八旗制的关系、明代军民变身为清朝领属的经过,这是明清时代国家转型的表现之一,也是清承明制的具体运作方式。通过考察清廷编纂《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凝聚满洲意识的努力,还可看出清廷塑造国家形象的手段,正是以大规模地消除不同民族、族姓间的差异、来源为前提的。这也提示我们,胜利者在塑造国家意识时,强调统一性,消除多样性,结果只能使权力日趋集中,也离历史真相越来越远。

其次,考察吴氏族人在明清易代过程中的动向,可重现不少隐秘的历史细节:私家记载中的“东宁镇抚”吴大斌,在清代官方、半官方记录中被隐去,显示清廷忌讳记载入关前臣属明朝的史事,涉及女真金国与明代真实关系的历史记录都被禁除。明朝经营辽东的努力和困难,抗金势力的内部矛盾,不透过吴大斌、吴廷忠、马骢与毛文龙的矛盾也难以显示;登州派与东江派的冲突,隐含着新旧势力对辽东利益格局的争夺;而吴兴祚祖孙三代的遭遇,隐藏着“异数”背后的内因及血腥。明、清政权的对峙与转移,固然离不开诸多州山吴氏这样的世家大族

① 参见王钟翰:《清代八旗中的满汉民族成分问题》,《王钟翰学术论著选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4—155页;张玉兴:《包衣汉姓与汉军简论——八旗制度兴衰的一个历史见证》,阎崇年主编:《满学研究》第7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323—343页。

② 杨鍾羲:《雪桥诗话余集》卷2,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1页。

③ 毛奇龄:《予告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陆公葵神道碑铭》,钱仪吉:《碑传集》卷40,第215页中、下。

支持,世家大族与统治政权结合的紧密度,也决定了该家族生命力的盛衰。吴大斌兄弟、子侄、祖孙三代的经历,显示吴氏家族在辽东持续上百年的经营,没有因为易代鼎革而湮没,反在贯通南、北血脉后,有了花开两枝的意外结果。

再次,吴氏家族注重积累财富。吴兑总督宣大时期,执行“款虏”政策,即大力从事与蒙古的经济、军需生意;其嫡子吴有孚与族叔吴宗道因地制宜,利用中朝边境的中江贸易市场及登州水师船只,从事朝鲜边贸及海外贸易,每年发货达20船左右;而吴宗道的外甥马骥也通过与后金的纺织品、杂货贸易,获得厚利而遭到毛文龙的攻击,并结下私怨,以致影响族人的命运。至易代之后,两广总督吴兴祚与海商的密切关系、不明来源的财富及“鼓铸浮冒”而被调职的经历,也都提示我们:这个家族的财富积累持续数代,具有善于利用体制缝隙从事多边贸易的传统。其贸易对象包括蒙古、女真、朝鲜及以澳门为起点的海外市场,贸易网络遍及内陆东北亚及东南沿海。这也是一个世家能够立足的经济基础。

最后,山阴州山吴氏族人的文化地位不容忽视。无论是作为宁、佟氏满汉弟子启蒙师的吴廷忠,还是吴大斌、大圭兄弟子侄在辽东自在州、清河、辽阳等地中式庠生、从事教授的资历,甚至吴兴祚的风雅,都可说明作为世家的州山吴氏族人所拥有的明显文化优势。换个角度看,他们对满族文化的提升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这些都可加深我们对明清易代、满汉民族融合乃至清承明制之说的具体认识,也使我们对明清之际的国家转型、个人与家族、社会、文化等有了不同方位、更多角度的感悟及体验。由此,明清时代欧亚内陆与海外世界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也或隐或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附:山阴州山吴氏世系简表

世系辈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一支大分	均礼	渊	琿	璇	源	便	意	兑	有孚	孟明	邦辅	瑞祯
一支二分	均礼	潜	昱	镜	稜	统	德华	上恩	存正	承恩	大英	廷恩
二支三分	均礼	潜	昱	铄	伟	相	九德	宗道	一麟			
二支三分	均礼	潜	昱	铄	伟	相	九霄	凝道				
二支三分	均礼	潜	昱	铄	佑	论	大斌					
二支三分	均礼	潜	昱	铄	佑	论	大益	廷忠				
二支三分	均礼	潜	昱	铄	佑	论	大圭	执忠	兴祚	秉均	绍曾	
二支三分	均礼	潜	昱	铄	佑	谔	大武					
二支三分	均礼	潜	昱	铄	佑	谔	大学					
二支三分	均礼	潜	昱	铄	僎	谨	嵩	显忠				
二支四分	均礼	潜	昇									

附识:匿名评审专家多次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耐心细致地指导本文渐臻完善,谨此郑重致谢!

〔作者杨海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

(责任编辑:路育松)

An Influential Shanyin Family and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Yang Haiying (37)

The fortunes of the Wu family of Shanyin in Shaoxing, Zhejiang Province, can act as a marker of the dynastic change from the Ming to the Qing. The family rose to prominence in the ninth year of the Ming Emperor Wanli, when Wu Dui became governor of Jiliao and Minister of War. Relying on the family's influence, a distant relative, Wu Zongdao, established close ties with Korea during the Eastern Expedition. Wu Dabin and his nephew Wu Tingzhong, from the same branch of the family, went to Liaoning but fled, either dying or living on as adherents of the previous dynasty. Their implacable opposition to Mao Wenlong reflects the contest between the new and old forces in Dengzhou and eastern Liaoning. The blood relationships behind Wu Xingzuo, newly ennobled in the eight banners, were artificially expunged due to the politics of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highlighting the Qing official historians' practice of blotting out forbidden details. By comparing official and private together with Chinese and foreign historical materials with various taboo names and examining the histories of some members of the Wu family, we can find the detail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ow this influential family fared and how it maintained its prosperity when the dynasty changed, as well as gain a partial view of the Ming government's difficulties in managing eastern Liaoning, the way the Qing carried on Ming institutions, and the tactics and features of the Qing construction of a national image. This research can deepen our awareness and perception of the multi-faceted issues involving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as well as society and culture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Ming to the Qing.

Western Discussion and Knowledge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Wu Yixiong (55)

Westerners' discussions and debates over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were not just an extension of European scholars' long-term interest in the subject; they represented a further development in a new er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Dutch scholar Isaac Titsingh and the French scholar Chrétien-Louis-Joseph de Guignes doubted or rejected the traditional system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Their work struck a chord with Christi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and with British and American scholars, who published a number of related works. Among them, Karl Gutzlaff's proposition that "Confucius fabricated history" and the view "the later the time of record, the earlier the start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was supposed to be" deserve note. However, French and German scholars such as Abbé Jean Baptiste Grosier, Heinrich Julius Klaproth and Agricola-Joseph Fortiad' Urban disagreed with these views. The two sides had a heated debate on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the *Shang Shu*, the Chinese historiographical tradition and the status of the biblical system of chronology. Although their viewpoints were different or even starkly opposed, they are still important for the history of Western Sinology and of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The Issue of the Chinese Side's "Plenipotentiary Powers" before and after the Negotiation of the Boxer Protocol

Dai Haibin (75)

As Ministers Plenipotentiary appointed by the Qing government, Yi Kuang and Li Hongzhang were the diplomatic representatives 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the negotiation of the